

存在主义

EXISTENTIALISM

K H A S a e n - Y a n g

(法)高宣扬 / 著

存在主义的理论力量及其在现代思想史上所
显示的经久不息的生命力
只能来自

存在主义本身所包含的真理性
来自

存在主义所包含的人道主义精神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存在主义

EXISTENTIALISM

K H A S a e n - Y a n g

(法)高宣扬 /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存在主义思潮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叶在欧洲大地上广为传播、影响深远——作为对两次世界大战和“上帝隐退”等对人的存在本身造成极大冲击的事件而做出反应的哲学思潮，当然其也发端于西方哲学传统的最深层，存在主义直面“存在的危机”，探讨了诸如焦虑、死亡、烦、人的无个性以及对上帝之死的体验等问题——这些与西方传统哲学显得并不那么相称的问题，但确实是与生活于苦难与忧虑不断侵蚀存在的时代中的人们紧密相关的人生课题。这些问题经由克尔凯郭尔、尼采、胡塞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加缪、萨特等哲学家的思索与回应之后，汇聚成了存在主义思潮。高宣扬教授的该本专著对存在主义思潮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分析，并将此书题献给他的先师——为存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付出艰苦努力的熊伟先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存在主义 / (法) 高宣扬著.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2017 重印)
(高宣扬文集)
ISBN 978-7-313-15709-6

I. ①存… II. ①高… III. ①存在主义-概论 IV. ①B0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6530 号

存在主义

著 者: [法] 高宣扬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 话: 021-64071208

出 版 人: 郑益慧

印 制: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印 张: 17.25

字 数: 408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3-15709-6/B

定 价: 8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12-68180638

谨以此书纪念熊伟先生 105 周年诞辰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欧洲生命哲学的新发展”(14ZDB018)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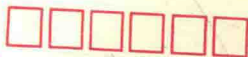


高宣扬教授与熊伟先生合影,武汉大学德国哲学研讨会,1987年

宣揚曾於十多年前自香港寫成此書相贈。
當時國內對此所知尚少，特予讚揚。

時隔多年，更以其間歷史與實踐多所校益，
對讀者體驗此學更多啟益，更宜及時出書也。

熊偉 1992.10.22, 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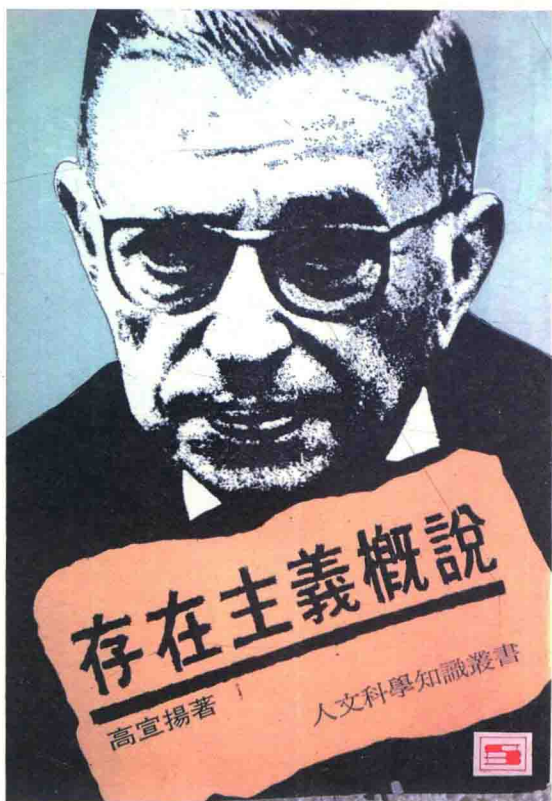


台北市士林區東英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
高宣揚教授



北京大學外語所贈
100871

熊偉先生于1992年10月22日寄给高宣扬教授的书信



《存在主义概说》，香港天地出版社，1978年



17

人文科學叢書

高宣揚◎主編

存在主義



高宣揚◎著

《存在主义》，台湾远流出版社，1993年

高宣扬文集总序

当我个人生命创建第七十环年轮的时候，我幸运地成为上海交通大学教师队伍的一员，使我的学术生命有获得新生的可能，我的生命也由此获得新的可能性，上演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生命乐曲。所以，我在交大“学者笔谈”上发表题名为“新鲜的交大人”的感言：“历史总是把我们带领到远离故乡的世界尽头，但有时又突然地把我们带回故居和出发点。历史使我们学会了感恩”。其实，生命永远是在自我给予和接受给予的交互往来中延伸，所以，感恩始终伴随着生命自身，构成了生命交响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生命的价值及尊严奠定本体论和伦理基础。

生命是一部无人指挥的交响乐，自创自演，并在不同的社会遭遇和生活历程中一再地自我协调，演奏出一曲又一曲美丽动听的自然乐曲，弹奏出每个人在社会、文化、历史的不同命运，演播成充满悲喜交织的无数千变万化的生命故事。

我的书实际上就是我个人生命历程的自我展现。每一本书从不同角度讲述着不同阶段的生命故事。生命的故事千差万别，归根结底，无非就是生命对自身生长发展的自我关注，都是由生命内在创造力量与周在世界各种因素相遭遇而交错形成的。生命在自我关注的过程中，

总是以顽强的意志和万种风情，一方面激励自身在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的悖论困境中脱颖而出进行创造更新，另一方面严肃正视环绕生命的外在客观力量，自然地要对自身的命运进行各种发问，提出质疑，力图寻求生存的最理想的优化状态，从而有可能逐步演变成哲学性的探索，转化为生命的无止境的形而上学的“惊奇”，对生命自身、对世界万物、对历史以及自身的未来前景，进行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的反思。

从学习哲学的第一天起，我就牢记古希腊圣贤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就是一种好奇”的教诲。从1957年以来近60年的精神陶冶的结果，却使我意识到：“好奇”不只是哲学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一切生命的生存原初动力。因此，对我来说，生命的哲学和哲学的生命，就是血肉相融地构成的生命流程本身。

生命的反思虽然表达了生命成长的曲折复杂历程，隐含着生命自身既丰富、又细腻的切身感受，但绝不会封闭在个人狭小的世界中，也不应只限于文本结构之中，而是应该置于人类文化创造的生命运动中，特别是把它当成人的生命本身的一个内在构成部分，从生命的内与外、前与后，既从环绕生存的各种外在环境条件的广阔视角，又从生命自身内在深处的微观复杂的精神状态出发，从哲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和美学的角度，试图记录一个“流浪的哲学家”在四分之三世纪内接受思想文化洗礼的历程，同时也展现对我教诲不倦的国内外师长们的衷心感恩之情。

最后，我还要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表示感谢，特别要感谢的是刘佩英女士和刘旭先生，他们对本文集的出版给予了最大的支持。

高宣扬

2016年4月8日

纪念熊伟先生 105 周年诞辰：2016 年新版序

今年是先师熊伟先生诞辰 105 周年。为了表达对熊伟先生的敬意，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刘佩英总编辑和哲学编辑刘旭建议我重版拙著《存在主义》。熊伟先生是中国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研究的第一大家，他本人不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亲自在弗莱堡大学聆听海德格尔的课程，而且也是第一位把海德格尔思想以及存在主义哲学传播到中国学术界的著名学者。从熊伟先生 20 世纪 40 年代返回中国起，直到 1994 年他逝世为止，先后在中央大学、同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名校，讲授存在主义哲学。

从 1957 年入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开始，我就受教于熊伟先生。大学期间，在熊伟先生开设的“存在主义”选修课上，熊伟先生为大家讲授系统的存在主义基础知识，同时指导我们精读《存在与时间》的两个章节，为我们掌握存在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2 年本科毕业之后，我有幸继续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研究生，受郑昕教授指导研究康德哲学，同时也使我有更长的时间求教于熊伟先生及北大的其他老师们，使我受益匪浅，终身不忘。

回想拙著《存在主义概说》1978 年在香港初版前以及出版之后多

次在港台再版修订时,熊伟先生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亲切细致的教诲,恩师谆谆教导之苦心,连同他在课堂上铿锵有力、清晰准确的语音,犹闻在耳,而其和蔼质朴之表情,历历在目,使我心绪万千,感恩之情,不能自己。

熊伟先生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有着极深刻的理解,同时又善于通过中国传统智慧和语言,阐述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核心概念,把我们引入存在主义哲学殿堂,使我们敞开理解存在主义的思路,奠定了一生学习和研究哲学的基础,同时也教给我们人之为人的道理。

我记得很清楚,熊伟先生在讲海德格尔所说的“亲在之敞亮”时,使用了禅宗关于自身对佛法的顿然领悟时所感受的“恬然澄明”之话语,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理解到海德格尔的用意。从我在课堂上第一次听到“恬然澄明”以后,这个最生动、最深刻和最需要亲身体会的用语,就一直伴随着我的生命旅程,也同样指导我不断地加深对“存在主义”本身的理解。

熊伟先生一向认为,哲学道理固然不同于一般的语言论述,但它们又是直接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把握哲学的真正“窍门”就是从自身的“亲在”体验入手!这也就是说,理解存在主义的关键,是首先把哲学当成学会自我生存的艺术,也就是佛教禅宗所说的那种从自身的“亲在”虔诚修身出发,切身体验生存于世的实践智慧。西方人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后,特别从笛卡尔之后,过于夸大理性的功能和意义,致使他们大多数只关心自身主体性的核心地位,往往忽略了对于自身“亲在”的存在论体验,并在很大程度上将自身的存在问题从属于认知活动和求利行为,到头来,尽管他们自以为把握了真理,获得自己所追求的利益,却忘记了自身存在的本体论基础,把“自身亲在”这样最根本的事情撇在一旁。

当熊伟先生试图用中国传统生命哲学和禅宗语词转译海德格尔的基本概念的时候，他所关注的，并不只是语言表达，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存在主义的基本道理不简单归结为主体性的哲学语言表述，而是使之直接变成自身亲在的领悟过程，一种活生生的在世做人的实践智慧，就好像禅宗所说的那种“恬然澄明”的哲学智慧。真正达到恬然澄明的境界，就达到了“说”与“不说”都无所谓“的境地，因为那是难以表达、也无求于表述的”的自然自得的境界，即所谓“有无混成”。

世界上那些有限的和可见的物质形式以及它们的有限道理，是可以用语来说出来。但“有无混成”的境界是物质与精神难以区分的最高生存状态，个人与周在的一切都自然地和谐交融成一体，惯常被人们分割成相互独立的“主体”和“客体”不再存在，呈现出最原始和最纯粹自然的存在原貌。

熊伟先生经常对我们说，中国哲学的传统概念“气”，就是一种表现“有无混成”原始状态的恰当范畴，它不能用西方的现代科学语言去表达，因为西方现代科学的一切研究，都建立在把世界物质化和对象化的基础上。但中国哲学用“气”的概念或范畴灵活地表现了世界的原始生命运动状态，深刻地表现了物质与精神的密切不可分割性；而且，物质和精神不但不可分割，它们之间简直就是在永远相互渗透中相互依赖，共同存在而发展。

谈到这里，我记得熊伟先生在 1978 年春对我说了他的导师艾利斯·罗塔克(Erich Rothacker, 1888—1965)教授。熊伟先生说，罗塔克曾经探询“气”的概念意义。他是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感兴趣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哲学人类学家。我就是从熊伟先生那里第一次听到“哲学人类学”这个学科的。我当时对“哲学人类学”一无所知，以幼稚的心情请教先生。正是熊伟先生最早给我关于哲学人类学知识的启

蒙。他指出,哲学人类学也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思考方法,它把现象学、存在主义和多学科研究结合在一起,把人与他的周在世界的关系列为研究的中心问题,因为哲学人类学首先承认:人的存在只能是“存在于世”,而存在于世就不能不探究人的存在与他物、他人以及整个周在世界的关系。熊伟先生指出:哲学人类学更细致、更深入、更具体地研究人的存在与周在世界的关系,所以,研究存在主义必须与研究哲学人类学并行;但可惜中国哲学界很少有人理解这个道理。

我在1979年之后,牢记先生的教导,为了深入把握哲学人类学,首先在法国向列维-斯特劳斯学习人类学,同时也注意德国从舍勒以来的哲学人类学的发展过程及其新成果,终于在1990年完成了拙著《哲学人类学》的撰写过程。当我在1992年见到熊伟先生时,他对我的哲学人类学研究给予了肯定。

当熊伟先生留学德国时,深受艾利斯·罗塔克的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影响。罗塔克的多学科研究方法继承了狄尔泰生命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思想方法,而罗塔克的重要著作《精神科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Tübingen 2. Aufl. 1930)和《逻辑与精神科学的系统性:哲学手册》(*Logik und Systematik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Handbuch der Philosophie*, München/Berlin 1926),就是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基本原理的新发展,这两本书都曾经是熊伟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存在主义的重要参考书。

1987年张世英先生在武汉湖北大学主持德国哲学国际研讨会,我有幸受邀参加,与我同行的,有法国哲学会会长雅克·董特(Jacques D'Hondt, 1920—2012)以及德国哲学会会长赫伯特·施奈德尔巴赫(Herbert Schnädelbach, 1936—)教授等。我们在那里一起愉快地会见了熊伟先生。会见后,我又单独与熊伟先生促膝长谈四次。

由于赫伯特·施耐德巴赫也是哲学人类学家，我向熊伟先生汇报了我多年来研究哲学人类学的心得，先生特地询问了德国在二次大战后对于哲学人类学的研究状况，对哲学人类学的新动向极为关注。

为此，我向熊伟先生提及吉森大学哲学人类学家奥多·马夸德（Odo Marquard，1928—2015）的新观点，强调 19 世纪末以来，促使哲学人类学从传统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脱离出来而成为独立学问的决定性因素，乃是对于人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集中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人类学是现象学运动的一个特殊成果，也是 19 世纪末以来试图摆脱传统形而上学和传统方法论的理论产物，它不只是满足于研究人的本质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哲学人类学应该区别于历史哲学、形而上学与一般自然科学而具有它自己的特殊的研究对象，即“人的生活世界”。这种观点显然是针对长期以来流行于德国哲学界的历史主义的一种“反动”。哲学人类学的出现和兴盛，说明历史主义的流行本身迅速地引起了它的反对派在理论上的抵制。

按照哲学人类学的新观点，传统历史哲学，是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特别是形而上学中研究“人”的论题的一个分支。历史哲学之形而上学性质，乃在于把“人”拘禁在设定的历史进程牢笼中。在传统历史哲学看来，人不是历史的主人，而是历史的奴隶；人的命运不是人自身所能确定的，而毋宁是历史进程的结果。所以，历史哲学虽然也研究人，但人的本质是在历史的逻辑中被扭曲；而且，人反倒成为在历史的时间持续性和空间广袤性的范围内被观察的“对象”，人的主体性反而在历史进程中不知不觉地消散了。

哲学人类学从一开始出现，就很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关于人的真正本质的研究，关于人的精神的本质及其活动，关于人与自然界，关于人在整个宇宙中的地位，关于人的行为与人的意识的关系，关于人

的道德与人的社会环境的关系，……所有这一系列有关人的根本问题，都不能单纯地从历史的维度加以观察分析。人固然是一个历史动物，但人的本质恰恰就在于他对于历史的积极主动的改造活动。而且，人作为人，首先并不是历史的产物，更不应为历史所限。人的本质是与人的特殊生活方式、他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他对自身的生活方式的抉择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奥多·马夸德在他的那本批判历史哲学的著作《历史哲学的难点》(*Schwierigkeiten mit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1973)中，总结出这样一句话：“历史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形式改变世界；但重要的是，不要骚扰它”(*Die Geschichtsphilosophen haben die Welt nur verschieden verändert; es kommt darauf an, Sie zu verschonen*)。显然，在哲学人类学家看来，历史与人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对历史的态度。真正的历史，只能是由人本身的生活及其行为所决定，而且，人对历史的态度也决定于人与其生活世界的紧密关系。

应该说，从历史的观点去研究人的本质，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历史哲学在研究人的过程中，自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第一次正式使用历史哲学的概念以来，曾经有过一系列重要的发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可以成为两个典型代表。但是，历史哲学远没有解决关于人的基本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近代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之后的历史哲学，在其发展行程中，大有系统化、自我僵化和教条化之倾向，以致某些历史哲学的陈腐概念和片面的方法论，始终干扰人们正确地理解人的本质。

正因为这样，有相当多的哲学家认为，近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发展，是黑格尔之后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危机的结果。施奈德尔巴赫指出：“哲